



战地萍踪

陆始



# 战地萍踪

陆治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封面字画：程十发

装帧设计：柳成荫

文字编辑：孙竞男

## 战 地 萍 踪

陆 治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教育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3}{4}$  插页 6 字数 180 千

1985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0

书号：10132·036 定价 1.80 元

# 代序

夏衍

今年八月，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艰辛岁月。

西方人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算起的，而我们中国遭到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则是早在八年前的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就开始了。从“九一八”到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陆诒同志在《战地萍踪》中说：“抗战前夕和抗战八年这个历史阶段，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有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单靠“大事记”和教科书是不够的。其一是争取到这一段“兴旺发达时期”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其二是从芦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这八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而

这种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合作”是曲折艰险、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要了解和总结“抗战八年”的真实历史，既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又要有身历其境者的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个意义出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战地萍踪》这本书的出版，是值得向史学界、新闻界、文艺界推荐的。

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当时他们都还年轻，有的是勇气和干劲，他们深入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前线，从事战地采访，他们跑前线，也跑后方，他们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他们也采访过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蔡廷锴、吉星文，他们既迅速地报道了战况，也客观地评介了人物。我一直还记得一九三九年在桂林“国际新闻社”的一次集会上，一位青年记者要范长江同志在纪念册上题词，他写了“书生报国，笔耕不已”这八个字，这表达了广大的爱祖国、争民主的新闻记者的心声。遗憾的是范长江、孟秋江两位都在十年浩劫中含恨去世了，陆诒同志“历尽劫波”，还能在暮年“笔耕不已”，写出《战地萍踪》这本书来，把他的报国之心和他亲身经历过来的真實历史告诉青年一代，这就更觉得弥足珍贵了。

抗战八年，我也一直在做新闻工作，陆诒同志在《大公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给了我许多新鲜的信息和启示。自从武汉弃守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于是大后方的一部分文化人就产生了一种“以党划线”的想法，“洪洞县里无好人”，“国民党全是顽固派”。陆诒的战地报道既尖锐地揭露了石友三、韩复榘、孙殿英，同时也恰如其份地表扬了吉星文、张自忠、卫立煌、傅作义。抗日战争是一场伟

大的民族民主革命，“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在爱国救亡的号召下，不单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即使是中央军嫡系的高级将领，他们的思想行动，也不是永远凝固不变的，傅作义、卫立煌、韩练成，都是明显的例子。据我记忆，最早报道卫立煌谈“打仗一定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军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仗就打不赢”，就是陆诒的《卫立煌访问记》。记得他还写过一篇《张自忠和伤兵对话》，我曾把这篇文章介绍给《救亡日报》同仁，告诉大家，把国民党都看成顽固派是不对的，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也是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

陆诒同志孜孜不倦地当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他朴质无华、勤奋勇敢，在那个时期当战地记者，客观条件的艰难险恶，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从香港脱险归来，他也从新加坡撤退到印度，翻过阿拉甘山，再经峻险的滇缅公路，比我后两个月才到达重庆。我给他看了蔡楚生画的《黄坤逃难图》，他也和我讲了他“手执缅刀”擦过缅北战场，“捡了一条命”回来的惊险故事。这真是杜甫诗中所说的“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情景。事隔四十多年，一回想还是记忆犹新。

我把《战地萍踪》推荐给广大读者，我相信读这本书，对于认识和总结八年抗战的历史，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都是有好处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

## 目 录

代 序 .....	夏 衍
前言 .....	( 1 )
闸北炮声 .....	( 3 )
初访蔡廷锴 .....	( 6 )
张治中淞沪杀敌 .....	( 12 )
汤玉麟如此“守”土 .....	( 15 )
傅作义热泪盈眶 .....	( 21 )
百灵庙劳军 .....	( 26 )
芦沟桥前线 .....	( 29 )
长辛店告急 .....	( 34 )
保定被炸 .....	( 37 )
访冯玉祥 .....	( 40 )
“铁军”军长张发奎 .....	( 43 )
川军抗日香案相送 .....	( 46 )
太原初访周恩来 .....	( 49 )
娘子关激战 .....	( 55 )
西安古城被炸 .....	( 61 )

访问延安.....	( 66 )
毛主席一席谈.....	( 71 )
周恩来纵谈时局.....	( 74 )
彭德怀盛赞游击战.....	( 77 )
从平凉到银川.....	( 80 )
西线指挥不统一.....	( 86 )
马鸿宾与马鸿逵.....	( 89 )
宁夏禁止救亡运动.....	( 92 )
武汉《新华日报》创刊.....	( 95 )
再访彭德怀.....	( 98 )
访彭雪枫.....	( 101 )
韩复榘被枪决.....	( 104 )
访李宗仁.....	( 107 )
津浦线上的东北军.....	( 110 )
孙连仲训练新兵.....	( 113 )
从信阳到六安.....	( 116 )
随李宗仁去合肥.....	( 119 )
二十军守安庆.....	( 124 )
扫雪三里迎川军.....	( 127 )
台儿庄前线.....	( 130 )
张自忠飞兵救临沂.....	( 138 )
徐州突围.....	( 141 )
《新华日报》慰问战地记者.....	( 147 )
大江南北军纪太差.....	( 150 )
李汉魂庐山抗敌.....	( 153 )
四照楼约会蒋经国.....	( 156 )

沈钧儒慰问将士	(159)
暂别武汉	(162)
炮声隆隆自从容	(165)
南岳军事会议	(168)
广州失守的内幕	(171)
香港同胞捐献救护车	(174)
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177)
潼关屹立在炮火中	(182)
随枣战役	(188)
张自忠与伤兵	(191)
中原战场见闻	(194)
卫立煌盛赞八路军	(197)
随邓小平政委行军	(200)
刘伯承平易近人	(203)
见到了朱总司令	(206)
三访彭大将军	(209)
左权将军纵谈战局	(212)
朱老总胸有成竹	(215)
东北军怀念张学良	(218)
军民奋战在冀南	(221)
冀中访程子华	(227)
跟吕正操夜行军	(230)
豪迈风趣的贺龙	(233)
李公朴在战地	(239)
到平西去	(242)
马兰村访萧克	(245)

山村出版《挺进报》	(248)
子弟兵打出了威风	(251)
神通广大的游击队	(254)
彭老总谈反摩擦	(262)
后记	(267)

## 前　　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我跨进上海《新闻报》馆工作。第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声在闸北打响，我开始到战地采访，学习做一个外勤记者。

在淞沪战场、热河、绥远以及抗战初期在芦沟桥前线，我经常与伤兵、难民困顿在厄运之中，他们的迫切呼声与痛苦呻吟，使我难以缄默；而抗战前线爱国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更激励我奋笔疾书，做了许多报道，以振奋人心。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我离开《新闻报》，由范长江介绍进《大公报》工作，被派赴山西战场采访。十一月初的太原，日军即将兵临城下，我在这里见到周恩来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将军，得到他们的热情关怀和正确指导。上海、南京和太原相继失守之后，一部分人悲观失望，人心波动。十二月初我访问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同志和彭德怀将军等领导人物，及时报道了他们对坚持抗战和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必胜信念。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我仍由范长江介绍参加该报工作，从此我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外勤记者，先后参加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从广东战区一直跑到华北敌后战场。一九四〇年滇缅路重新开放，我曾走过这段险峻的公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从新加坡撤退到印度，翻越印缅边境

的阿拉甘山脉，走到伊洛瓦底江的平原，其时我远征军正与日军在缅甸北部作战。几经险阻，我才回到重庆。所有这一切采访活动，我都在《新华日报》上作如实的报道，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我们的通讯报道时常遭到扣发或删改。今天，我得到机会来重写这段亲身经历，就可以对当年扣、删的部分有所补充。值得庆幸的是：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当年的采访笔记、日记和剪报资料，即使在十年浩劫中也未被抄走，这对我写回忆时力求符合历史真实，有莫大的帮助。

抗战前夕和抗战八年这个历史阶段，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有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坚决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充分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去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基础。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当年，强敌压境，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全国爱国军民万众一心，艰苦奋战，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建设四化，此时此际，为振兴中华，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更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愿！抚今思昔，我以拙笔写下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战绩，希望能对统一祖国的事业有所促进。

## 闸 北 炮 声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发了淞沪抗战，晚上，我住在《新闻报》报馆三楼宿舍，半夜里从睡梦中惊醒，隔壁采访科里电话铃声不断，人声嘈杂。一打听，原来驻闸北的中国军队同东洋兵打起来了！整个编辑部为此紧张起来，大部分人激昂慷慨，“九·一八”以来忍辱偷生，今天，中国军队居然奋起抵抗侵略了，为此感到扬眉吐气；也有少数人心惊胆怕，认为打起仗来，就不能再过太平日子了。我随许多同事一起跑到五层楼屋顶，倾听从闸北传来的一片枪炮声，大家你一句、我一言地在议论，推测打在什么地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闸北传来的枪炮声更加紧密，敌机临空，进行残暴的轰炸。宝山路上的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被炸燃烧，烈焰腾空，大量的纸屑和灰烬被北风吹进了租界，民族抗战的义愤也象烈焰似地在我胸中燃烧。这时当务之急，莫如派记者到闸北战地去作现场采访了。我主动去找采访科副主任顾执中先生，表示愿意去闸北前线采访，不求保人寿险。他欣然同意，派我随原来分工跑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李祖唐到北站去采访。那位老记者李先生对我上下打量，问我的姓名和年龄，他对我这个二十一岁的新兵表示欢迎。他说：“此刻去北站，不是有人请客吃饭去，而是上枪林弹雨的战场，有你结伴也好壮壮胆。”

我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绕道出发，由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往西走出租界，经中山路桥到达闸北。这里同租界相比，确是两个世界，头上敌机盘旋侦察，周围枪声时断时续。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第六团（张君嵩团）所部士兵守卫在街垒旁边，附近居民在协助军队加固防御工事。走到闸北中兴路，适遇敌机低空扫射，出租汽车的司机立即停车躲避。等敌机过后，司机说什么也不肯驱车前进，我们进退两难。最后我建议：“让我一个人走到北站先去看看，你们可在此等候，如果时间超过两小时，那就不必再等了。”

走进被日军炮火轰毁的北站，看到有几列车厢歪倒在路旁，电线、玻璃碎片狼藉满地，前面不时响起步枪声。经过好几道哨兵盘问，最后由一位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诺尔医院当护士的中年人带我到前线指挥所。这个中年人我曾在医院中多次见到，彼此都面熟，我问他什么时候到军队里的？他说：“昨晚，枪声一响，我就到北站来自动投军，做我应该做的工作。”问他姓名、住址，他笑而不答。抗战的枪声就是号召，群众中自愿参战的无名英雄真不少。

前线指挥所设在北站东侧的一间小屋中，那天接见我的，不是意料中的十九路军军官，而是刚从南京调来的宪兵第六团第三营营长李上珍。

李营长先带我到观察哨去看日军阵地，向我详谈二十八日晚上作战经过。宪兵第六团奉调到上海，是来接收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区，原想缓和紧张局势的。李上珍的第三营作为先头部队于二十七日晚间到达北站。二十八日上午，他就去拜访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张君嵩团长，双方商定移交防区的各项部署。不料就在当天晚上，日军就杀上门来。“战斗打响时，”李

营长说，“我首先接到张团长的紧急电话，他问我前面情况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打算？我说，敌人既打第一枪，我们不能不回敬第二枪，敌人打来，我们只有拚，这没有什么好讲的。我现在坚决服从你的指挥，坚守阵地。张团长听了我的答复，在电话中纵声大笑。他说：‘那好极了！我们都是爱国军人，在敌人进攻面前，再不要分什么十九路军和宪兵的界限，只有团结一致，狠狠地打！’日军有好几次想冲过宝山路向北站猛扑，都给我们奋勇击退。敌机曾在宝山路一带投下大量烧夷弹，纵火焚烧房屋，想利用火攻来扩展他们的阵地，我们一定要沉着应战，决不辜负上海人民的期望！”

眼前的事实，反映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国民党军队内部已起了分化，一部分人坚决主张抗战，即使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宪兵，当日军杀上门来时，他们也置上峰缓和“紧张局势”的命令于脑后，奋起抗战。可笑的还是那位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少将，他曾在日本报纸上发表谈话，宣称：一旦发生战争，四小时即可了事。结果打了一个多月，证明所谓皇军也不是不可抵抗的。

## 初访蔡廷锴

第二天，一月三十日上午，我到市郊真如访问十九路军军部。当时军部暂设在真如东站南首的一座名为“范庄”的住宅，门口除有一名战士站岗警戒以外，别无显赫气魄。离门口不到两丈远，有一架被我军击落的敌机残骸停放着，引人注目。它是昨天被我军击毁的。昨天，雨雪纷飞，还有点迷雾，敌机以为我们没有高射炮，竟敢在一千米以下作低空扫射来威胁我们。军部卫兵连即以步兵排编成几个小组，用步枪组成火力网对空射击，一颗子弹恰恰击中飞机的油箱，立即引起大火燃烧，落到地上，人机俱毁。

到了军部，我受到七十八师秘书徐名鸿的热情接待，他是广东梅县人，谈吐不俗。他说十九路军打的是反对侵略的义战，得到了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他认为：军队只有成为民众的武力时才能克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接着他介绍我去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

蔡将军是高个儿，剃平顶头，一张晒得黑黑的广东农民的脸，穿一套黄呢军服，钮扣也没有扣好，不断地抽烟，他正在与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商量重新部署部队，迎击日军新的进攻。我趁等候的空隙，打量了一下蔡将军用以会客兼卧室的这间小屋。这是一个简陋的房间，墙上挂着军用地图，一张行军床铺在一角。另外，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桌椅板凳。据说这

“范庄”原是广东人范肖之的别墅，战事甫起，住户们纷纷撤离避难，十九路军军部就暂设在此。不一会，区师长谈完公务，起身走了，徐名鸿趁前把我介绍给蔡将军，并向他转达了我的采访要求。蔡将军握了握我的手，说声“请坐”，沉吟片刻，就向我详谈这次被迫抗战的经过。

一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和社会闻人杜月笙、杨虎等访问蔡将军。他们说：“贵军长体念政府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驻军，以求息事宁人，保存上海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同人等无限钦佩，除代表上海民众特致慰问致谢外，并预祝军长北上杀敌成功。”听了这番话，蔡廷锴想起一月二十四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到上海同他说的话，两者是一个意思。何应钦说：“现在国力未充，一切均无准备，日军虽有压迫，政府仍拟循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日方无理要求十九路军后撤三十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我军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望遵照中央意旨实行。”同时，何应钦决定，由南京调宪兵来接防。由此可见，南京政府和上海地方当局早已商量停当，答应日方无理要求，屈膝让步。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蔡将军只得遵照何应钦的决定同意换防。

谈到这里，蔡将军显出忍无可忍的神情。接着，他说：“正当宪兵尚未接防之时，二十八日晚上十一时十分，日军竟然先开枪进攻闸北，我即命令张君嵩团迎头痛击，决不能后退。

“我和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立即驱车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与戴戟司令等召开军事会议，共商抗敌大计，一面报告上峰并命令我军全部限三日内集中上海附近，一面通电国内外同